

《水浒》

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7·41
5

87

《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北票矿务局运输部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181号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287×198.5mm 印张: 274

字数: 54,000 印数: 1—20,000

1976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制

统一书号: 3090.417 定价: 0.17元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
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
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
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 迅 论《水 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
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
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编 者 的 话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一场群众性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已经热烈展开。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认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和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我们编写了这本评论《水浒》的小册子，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广大干部和群众评论时参考。

这本小册子基本上以一百二十四本《水浒》为依据，同时参阅百回本和七十一回本的有关部分，着重评论《水浒》宣扬投降的主题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了适应目前尚未阅读《水浒》全书的读者的需要，还作了一些必要的情节叙述。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录

一 农民起义的销蚀剂	
——谈《水浒》故事的演变和流传	1
二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	
——论《水浒》的主题	12
三 终于是奴才	
——论宋江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26
四 投降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	
——谈《水浒》与孔孟之道	50
五 不愿意投降的人们	
——略论梁山的革命派及其反投降斗争	63
六 深入评论《水浒》，坚持反修防修斗争	80

一 农民起义的销蚀剂

——谈《水浒》故事的演变和流传

《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它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为背景的古典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并不是哪个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经过从南宋到元末的二百年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演变和发展，最后由作者施耐庵^①编整加工而形成的。解放以来，有不少人认为，《水浒》故事的演变和流传是出自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需要，《水浒》故事鼓舞着广大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意志；广大农民的革命理想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水浒》故事的内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究竟《水浒》故事的演变和流传，是出自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需要，还是来自封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烽火的反革命需要？这是我们评论《水浒》时首先应该

注：①《水浒》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说是施作罗编。全国解放后，有关部门曾对施耐庵的生平进行了一次调查（见《文艺报》一九五二年二十一号），施耐庵确有其人，原籍江苏吴县，后迁兴化，是元末至顺年间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元末农民大起义期间，和曾受元朝招安的张士诚有过联系。明初召征不赴，不久死去。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虽然不能断定他是《水浒》唯一的最后加工者，但他是《水浒》的主要整理加工者是可以肯定的了。

弄清楚的问题。

(一) 以投降为中心环节的演变和流传

关于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史实，史传上只有过零散的记载。根据《宋史》、《东都事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朝纲要》等书上说，宋江起义，是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一支规模并不太大的农民起义队伍。他们主要活动的时间是宋徽宗宣和年间，活动的地区是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苏北一带。宋江起义的结局，史传上的记载大同小异，《宋史·徽宗记》上说是：“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记载的是兵败投降。投降以后的事，说法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宋史·侯蒙传》上侯蒙曾上书徽宗：“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的记载，说是受招安后，参与了镇压方腊的起义。鲁迅根据洪迈《夷坚乙志》的记载，推断宋江可能投降后被杀。总之，《水浒》故事所用做依据的宋江起义，是一次因为投降而失败的农民起义。

宋江所领导的这次失败了的农民起义故事，在南宋时期即广泛流传，不仅见于“街谈巷语”，而且有高如、李嵩等画家为他们画像，有龚开给他们撰写《宋江三十六人赞》。同时更被广泛流行的话本小说的作者引为题材。如南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中曾列举了许多象《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演说《水浒》故事的题目。此外还有一本《大宋宣和遗事》，开始把一些散在的故事连

缀在一起。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水浒》故事，比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是关于宋江受招安后打方腊的情节。根据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浪里白跳”张顺的赞语“愿随忠魂，来骂怒潮”，可以断定，包括张顺在杭州被击毙的情节在内的宋江打方腊故事，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也写了宋江率领三十六人“归顺朝廷，各受武功大夫诰勅”，和后来宋江因打方腊有功，被封为节度使的情节。这说明，宋江打方腊，在南宋就已经被演义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文艺形式到处流传了。不仅如此，《大宋宣和遗事》中又出现了宋江受九天玄女“天书”的情节，给宋江规定了“广行忠义，殄(tiǎn)灭奸邪”的任务，于是宋江形象又发展了一步，成了封建统治制度的“护法神”了。

到了元代，《水浒》故事的流传更有所发展，除了话本之外，又大量在杂剧中出现。随着《水浒》故事情节的发展，宋江的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也被描绘得更加完整。在元杂剧中，三十六人已发展成一百〇八人，即所谓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喽。宋江绰号是“顺天呼保义”，“聚义厅”变成了“忠义堂”，同时扯出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并且有关盖“三打祝家庄”身亡，宋江成为寨主的叙述。《水浒》的作者就是在这些演变、发展的情节的基础上，进行编整加工，而写成这部小说的。根据上述情况，使我们不难看出，《水浒》故事是以宣扬投降，提倡受招安为中心环节和演变发展起来的。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

的政治路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广大农民，他们的革命理想是推翻封建统治，他们所赞扬的是为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革命精神。因此，以宣扬投降而演变发展起来的《水浒》故事，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广大农民的革命理想的反映，而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烽火的反革命要求在文艺上的反映。

（二）封建统治阶级招安策略的产物

为了弄清楚《水浒》故事演变、流传的阶级基础，必须对宋元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南宋政权继北宋之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腐朽的政权，它一方面向北方的女真贵族屈膝投降，一方面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南宋的辖区，虽然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南宋统治集团的税收却两倍于北宋。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以致三分之二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因此，南宋以来农民起义从未间断。以钟相、杨么为首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焚烧官府，夺取富豪地主的土地财产，且耕且战，前后持续五年之久。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烽火，南宋统治集团除了一再进行血腥的军事镇压之外，更采取“招安”的办法收买起义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以瓦解农民起义军队伍。“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当时的农民起义队伍中，必然要混进一些投机分子和地主阶级代理人。这就给了封建统治集

团扑灭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以可乘之机。对锺相、杨么起义军，南宋统治者就是一方面用大军进剿，同时采用岳飞“以水寇攻水寇”的战略，“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援”（岳珂：《金佗粹编》），也就是用从起义军内部收买几个象杨钦那样叛徒的办法，把起义军镇压下去的。

在元代，蒙古奴隶主贵族王朝，对人民的统治更加残暴。蒙古贵族和为其服务的僧侣把数以千万计的大量人口沦为奴隶，广大农民则在半奴隶制的状态下生活。在北方，大量农民被强迫耕种“屯田”，受着农业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在南方，由于汉族大地主与蒙古贵族集团相勾结，霸占大片土地，广大佃户也都在半奴隶制的状态下生活。蒙古贵族集团只顾对人民进行残酷掠夺，根本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所以从中叶以后，各地经常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人相食”的现象极为普遍，长期被奴役的广大劳动人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在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农民战争的烽火又一次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面对着这种势不可挡的农民大起义，蒙古贵族集团所采取的策略也仍然是反革命两手。例如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曾被元朝招安，使起义部队变了质，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当然，多数的起义军将领如刘福通、郭子兴等人都是坚持斗争的。所以元王朝并未能因为它的军事镇压和怀柔政策而苟延寿命，终于被农民革命战争的怒涛所淹没。

宋元两代政权都非常注意在思想文化上对人民的统治。宋高宗赵构曾下令各州郡所有刻板书籍，都要送秘书省检

查。有个李孟坚因其父李光撰写野史失实，就被流放到远恶军州编管。在元代，刑律规定：凡撰写词曲有犯上语言或讥议朝官的，要处死刑和流刑；谈说禁书的处徒刑。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南宋以来有关真正的英勇不屈的农民起义的记载，都毫无例外地极尽其歪曲、诬蔑之能事，如对方腊和钟相、杨么起义的记载就是一例。

方腊、钟相、杨么和宋江，同是农民起义，为什么对前三者，统治阶级视如洪水猛兽，禁止他们起义故事的流传，而对后者，不仅为其故事的流传大开绿灯，而且大加赞赏呢？答案很简单，禁止流传是出自封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需要，鼓励流传并大加赞赏，也是出自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需要。龚开在他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所以要为宋江等作赞语，是因为看到《东都事略·侯蒙传》中谈到对于宋江等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收录龚开赞语的《癸辛杂识》的作者周密又补充说明：“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立号既不僭（jiàn）越，名称俨然就循轨辙”，最后他无限感慨地说，“与其逢圣公（指方腊）之徒，熟若……江也。”周密这个封建文人立场是很鲜明的，他看到方腊与传说中的宋江，虽然同是农民起义，但方腊起义席卷江南，称王建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宋江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不仅名号“犹循轨辙”，而且终于投降受招安，并且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去镇压其它农民起义军，真是一箭双雕。对于这样的“好强盗”怎能不为他树碑立传，歌颂一番呢？

综上所述，《水浒》故事的演变和流传，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精神成果”，也并没有寄托农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剥削的愿望”，而恰恰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文艺上的反映。正象上面说过的那样，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历来是“剿”、“抚”并用的。宋江故事就是适应这个“抚”的政策而发展起来的。南宋统治阶级采取“剿”、“抚”结合的反革命策略，消灭了杨么起义，又以文艺形式宣扬宋江投降打方腊的故事，一武一文，互相呼应，构成了南宋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总的阵势。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集团，面对着漫天而来的农民起义的烽火，也使的是这种反革命两手策略。《水浒》的作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把《水浒》故事汇集编整成书，反对造反，宣扬投降，以适应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烽火的需要的。因此，我们认为，《水浒》故事在宋元两代所以能用各种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广为流传，主要原因是由于它配合了反动统治者的“抚”的策略，是一种农民起义的销蚀剂。所有把《水浒》故事的演变、流传加以美化的各种奇谈怪论，都是为宣扬《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三）金圣叹腰斩《水浒》 和胡适吹捧《水浒》

《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自从成书到现在，已有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六百年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据《兴化县续志》载，明初王道生为施耐庵所作的一篇墓志

上说，《水浒》最初的书名是“江湖豪客传”。明嘉靖年间高儒著的《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关于《水浒》版本的最早记载。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明嘉靖时的《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可是只残存第十一卷（五十一回至五十九回）一卷。因此施罗原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国内现存较完整的旧刻本，可分“简本”与“繁本”两种。所谓“简本”，以叙事为主，描写铺陈较少，共有一百十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等几种。所谓“繁本”，就是现在所常见的几种描写细致，有较多的艺术加工。“繁本”系统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三种。百回本现存最完整的是明万历三十年前后杭州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解放后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改名为《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百二十回本与百回本的不同处在于吸收了简本中打田虎、王庆故事，其它则与百回本相同。最早的刻本是明万历年间杨定见作序，袁无涯刻印的《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均有一百二十回《水浒》出版，名为《水浒全传》。

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回本。这是明末清初反动的封建文人金圣叹的删节本。他在百回本的基础上，把七十一回以后的二十多回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等情节一概删去，把“引首”和第一回编为“楔子”，在原第七十一回中加上卢俊义“惊恶梦”的情节，写卢俊义梦见梁山一百零八人被嵇康（影射张叔夜、因嵇康号叔夜）全部斩尽杀绝，以发泄他对农民起义

的刻骨仇恨。但经过金圣叹这一砍，《水浒》成了“断尾巴蜻蜓”，《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不完整了。

金圣叹腰斩《水浒》，正如鲁迅所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的昏庸，首先表现在他对百回本《水浒》的认识。在金圣叹看来，宋江等人都是“揭竿斩木”的强盗，于是咬牙切齿地认为“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但《忠义水浒传》却让这些人受了招安，“幸免于宋朝之斧锧(zhì)”，并称之为“忠义”，所以他认为这是名实不符，如果这样流传下去，那就“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了。对于招安宋江，使讨方腊的反革命策略，金圣叹更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既有“失朝廷之尊”，也有使两支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的危险，所以他认为“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入失焉。”金圣叹这个顽固的地主阶级分子竟然不懂得宋江的“曲线尽忠”，不了解梁山的“弯曲”，不理解《水浒》作者扑灭农民起义的阴险用心，真是“昏庸得可以”。

了解了金圣叹对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认识，就可以了解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目的了。金圣叹认为宋江不配称“忠义”，所以把“忠义”二字砍掉。他还认为如果宋江不仅受了招安，而且做了官，那么怎能保证在后世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学《水浒》的样子造反呢？（“恶知不将有若干十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所以不仅砍掉受招安的情节，而且加上一段“惊恶梦”，妄图用把梁山起义军斩尽杀绝的办法，吓倒革命人民，这样，《水浒》这本书才能起

到农民起义的销蚀剂的作用，可算是费尽了反革命心机。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又足以说明金圣叹真是“昏庸得可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历来是刽子手和牧师的反革命两手交替使用的，反动文人金圣叹只知道当刽子手，而不懂得当牧师，只能算得上封建阶级的一条“乏走狗”。当然他也更看不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人民是吓不倒，抓不尽，杀不绝的，只要剥削制度存在一天，广大革命人民的反抗烈火就燃烧一天，直到把这个腐朽旧制度烧为灰烬。

被腰斩后的《水浒》，使叛徒宋江的形象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受到割裂而显得不真实了。七十一回以前所描写的主要的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阶段，七十一回以后才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丑恶嘴脸的大暴露。没有受招安，没有打方腊，就不能更清楚地看出宋江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也不容易看出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是断送梁山起义的关键。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梁山起义的前一时期，宋江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还带有某些欺骗性。所以有些人对《水浒》的某些糊涂认识也反映出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恶劣影响。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这只“断尾巴蜻蜓”，长期以来，流传很广，影响极坏。解放后，仍然有些人对金本大加吹捧，说什么金圣叹腰斩《水浒》，动机虽坏，“收到的效果却极好”，据说是它保存了《水浒》的“精华”，真是荒谬已极。金本《水浒》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坏影响，是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对《水浒》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考证分不开的。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

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投降派评投降主义自然要比金圣叹来得高明。他首先是对金圣叹贬斥宋江颇为不满，他极力为宋江剖白说“《水浒》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他认为宋江是“仁义”的“英雄”。因此说金圣叹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不过，尽管胡适对金圣叹骂宋江很是愤慨然，但是出于他仇恨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反动意图是很理解的。他说金“大胆地把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删了，又加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正因为如此，骂金圣叹“迂腐”的胡适，对金的“文学眼光”却赞叹不已，于是金批本《水浒》又被他捧为“永不会磨灭的奇书”了。其次，胡适还煞有介事地考证出《水浒》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这个反革命警觉性很高的洋奴才非常懂得，如果公开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不能发挥其革命销蚀剂的作用，于是给它加上一个“反抗”的标签。但是如果象《水浒》那样“反抗政府”，就必然要搞投降主义，出卖革命，成为反动官僚了事。金本《水浒》经胡适一番考证之后，变成“反抗政府”的“永不会磨灭的奇书”，于是有人上当受骗，出现一些诸如《水浒》是“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金本《水浒》保存了《水浒》的“精华”之类的奇谈怪论。因此，我们在评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同时，也要戳穿胡适的骗局，肃清其流毒。